



FU DAN HU 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现当代文学新论：

义理·伦理·地理

王德威 著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现当代文学新论：

义理·伦理·地理

王德威 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 / (美) 王德
威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
ISBN 978-7-108-04824-0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世界文学—华文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9343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 数 157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5.00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序

这本文集收录了六篇根据讲稿所形成的文字稿。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六日至十二日，我应复旦大学光华基金人文学者讲座邀请，在复旦作了四次报告，构成本书的四篇正文部分。另外两篇附录则源自同年五月十三日、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博雅论坛所做的两次报告。这六篇讲稿因为都触及个人近年所关心的研究议题，因此总成一书出版，就教各方。

我在此特别感谢两校以及复旦光华人文基金、北大中华青年精英基金会的盛情邀请。也要感谢参与策划、主持、对话的同事：复旦大学陈思和、葛兆光、陈引驰、傅杰教授等；北京大学陈平原、陈晓明、黄子平、张辉教授等。谢谢陈平原教授同意我将北大二讲收入此书。当然，必须要衷心致谢的是所有莅临讲座现场的来宾与同学。

本书书名《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大致说明这六场讲座的焦点：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论辩；

文学与社会、政治群我关系的省思；文学史和文学地理的重新探讨。因为演讲形式所限，各篇文稿的讨论每有不够深入之处，文字及参考数据也时有疏漏。但我仍希望此书至少能够对我所关心的议题作出描述，以期引起更多对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同仁的悉心编辑，谨此一并致谢。

目录

1 序

1 第一讲 重写“重写文学史”：十个“关键”时刻

53 第二讲 批评方法与中学西进：兼论晚期梁启超、晚期
陈寅恪

115 第三讲 文学地理与国族想象：台湾的鲁迅、南洋的张爱玲

181 第四讲 文学伦理与公民意识：冯至、沈从文的启示

247 附录一 启蒙、革命与抒情：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命题

277 附录二 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

308 出版后记

第一讲 | 重写“重写文学史”：
十个“关键”时刻

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界不断思考和实践的课题。在新的世纪里，我们究竟要如何“重写”已经“不断被重写”的文学史？针对这个问题，本讲分成三个部分讨论。首先，将“重写文学史”的活动、话语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所引起的波澜，回归到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脉络里观察。其次，我们将焦点放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1〕}一批年轻学者对于文学史的脉络及思维模式的重新思考。在第三部分里，我将重写“重写文学史”的话题放在哈佛大学出版公司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

〔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政治、社会、文学都进入转折期。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将“文革”结束后的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将此时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一九八六年“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提到，新时期文学是继五四运动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一次的文学革命。详细资料参阅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编纂计划^{〔1〕}中思考，寻求另一种可能的写作方式，以及在海外华语语境中，我们对文学史的新发现与新见解。最后以实例说明这一计划试图纳入什么，其原因为何？

一 作为方法的“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和复旦大学有密切的关系，也和上海的文学、文化环境有关。以下我简单交代“重写文学史”的背景和它产生的种种结果，再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史事件。

一九八八年，上海两位年轻学者陈思和、王晓明^{〔2〕}在经过一连串思考后，开始探问现当代文学是什么？现当代文学史是什么？现当代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藉由《上海文论》^{〔3〕}的专栏，展开一系列对这些话题的思考。当时这两位学者也许没有预料到这个文学史的重写活动竟引起文学界的大变动。事实上，从一九八八年六月到

〔1〕 计划预订二〇一六年完成。

〔2〕 当时陈思和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王晓明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3〕 《上海文论》创刊于一九八七年一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

一九八九年夏天,《上海文论》刊登了将近四十篇专论,讨论文学的形式、主题、大师、经典,乃至迂回于文学背后、支撑文学发展的种种历史因素,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都在讨论之列。如赵树理现象、柳青现象、丁玲的问题等,都被纳入文字相互辩证、众声喧哗局面中。“重写文学史”不应只被当成是简单的文学史事件而已。在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化热发展到最精彩的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时,已经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文学作品出现,或寻根、或先锋,气象各不相同,文学研究者也各自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事实上,“重写”这样一种冲动,可以说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展开了,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1]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内容谈到一九八五年一批年轻学者,包括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等开始对文学史有了新看法。这三位在北京万寿寺^[2]提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对于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有了“‘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基本设想”^[3]。从今天的角度回顾,也许觉得这个观念的提出,似乎没有特别了不起的含义。但是回顾以往

[1] 参见王晓明:《从万寿寺到镜泊湖》,收于《刺丛里的求索》,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页242-256。

[2] 北京西三环万寿寺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旧址。

[3] 同注1,页242。

文学史对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严丝合缝的时期划分，对如《新民主主义论》这类政治叙事的呼应，可以得知“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广义的文学史时间跨度，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突破。同时陈思和也提出了“新文学的整体观”^{〔1〕}。这些都提醒我们，文学史的书写、理解不应该仅局限于一时一地，或是一家之言。从一九四九年到八十年代，在经历种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钳制，尤其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重新思考文学史写作的契机已经到来。

其实文学史自有它的历史脉络，它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发明。然而中国文学史在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或教学意义下，文学史却好像成为天经地义的建构。一九〇二年，清廷在《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树立了现代定义的“文学”的观念。当时所谓的文学包括了经学、理学、史学、诸子学、掌故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这和今天所强调的以审美为对象，特别着重创作和阅读主体互动，以西方浪漫主义之后为基准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观点，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却是现代中国对“文学”学科最初始的定义和创造。时间到了一九〇四年，《奏定学堂章程》中，文学居然包括了文学、地理学和史学，再一次说明了在新旧过

〔1〕 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渡的阶段，“什么是文学”这个观念本身是不断经过对话、激荡才产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教学的需求，催生“文学史”的写作成为必要。^{〔1〕}

一九〇四年，任教京师大学堂的年轻教师林传甲（一八七七——一九二二）编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2〕}，当时他所以撰写文学史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因应教学的必要。他所参照的是日本学者笹川种郎（一八七〇——一九四九）于一八九八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3〕}，林传甲于该书卷首说明：“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已成书焉。”^{〔4〕}他借用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一书的体例，将它运用至中国语境，重新加以改造，赋予不同价值取向以因应当时教学及研究需求。与此同时，另有苏州东吴大学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和寥

〔1〕 见陈国球详细的说明：《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〇一三年。又见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2〕 林传甲编撰之“中国文学史”讲义，原署名林归云。其后正式出版《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初印；广东育群书局一九一〇年；上海科学书局一九一〇年；台北学海书局一九八六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3〕 笹川种郎《支那文学史》于一九〇三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改书名为《历朝文学史》。

〔4〕 林传甲、朱希祖、吴梅著，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页29。

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出现^{〔1〕}。在此意义上，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化的建构，作为一种教材的必需工具，它出现的时间点，其实离现在并不太远，也不过是一百多年而已。但在这一百多年里，文学史却发生了许多变化。

自一九二〇年代以降，文学史写作已蔚为风潮。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至一九三〇年代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九四〇年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是以一种宏观的方式，企图为一个文类、一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或者是广义的中国语言、文学作出描述。实际上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脉络的关照，大约也起自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并延续至今。例如一九二二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九三〇年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之后的一九三〇年代正是中国文学史写作风起云涌的时代。然而对于什么是“现代”的看法，也引起了许多变革性观点，王哲甫、钱基博、周作人等各持见解。稍涉猎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读者可能不解，他为何将现代文学和古典的各种文类、体类杂糅不分，但是对于钱先生而言，从更宏观的文学流

〔1〕 黄人：《中国文学史》，国学扶轮社约一九〇五年；窦警凡：《历朝文学史》，线装铅印本，未标明出版处。

变角度来看，一切“本应如此”。^{〔1〕}周作人撰写于一九三二年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则将新文学源流上推到晚明时期。周作人认为中国新文学并不是始于“五四”，也不是从晚清开始的，晚明的公安派、竟陵派追寻自我、纯任天然的企图，才是活水源头。这当然与周作人自己的文学品味有关。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文学的来龙去脉、源头和发展的各种辩论已经展开。其他的例证尚有一九三七年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一九三九年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等，不一而足。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学史的写作又出现新的变化。新政权已经建立，无论年轻或资深学者，都觉得有必要呼应当时建国的热情及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写出他们心目中的文学史，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这个时期的文学史作者努力为中国现代文学打造出一个新的谱系，将它的身世重新述说。而如此述说的方式，必须是和国家的要求严丝合缝的，于是国家和文学之间微妙的隐喻关系便呼之欲出。

〔1〕 见魏泉的分析：《从钱基博的“集部之学”到文学史》，《读书》二〇一三年第五期，页153-163。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海外的另一群文人则以不同的历史眼光或政治立场写出对文学史的看法，例如香港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台湾刘心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等。当然，其中最著名的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此再次证明，文学史写作一直不断地鼓动着我们重新认知及思考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

新时期以后，文学史写作如雨后春笋般冒现，根据张泉教授的统计，以中国内地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即完整的现代文学断代史为例，从一九五一年到二〇〇七年为止，检索到的出版数量已经有一百一十九部之多。^{〔1〕}另外，依据许子东教授的统计，时间始于一九四九年到当代的文学史写作，自八十年代以来截至二〇〇八年十月，中国内地至少已出版了七十二部。^{〔2〕}这些都是以大叙事作为基准的文学史写作，标榜起承转合、一以贯之。其他各种形式的文学史思考或写作的出版量当然就更不在话下。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学史写作中，我们当然看出了时

〔1〕 张泉：《现有中国文学史的评估问题——从“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谈起》，《文艺争鸣》二〇〇八年第三期，页54-56。

〔2〕 许子东：《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〇一〇年第二期，页26-42。

代的变貌。不同时空里，关于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历史，书写者的自我期许、阅读者的种种反应等，就有不同的呈现。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末，随即再次展现了它的另一种生命力。

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八年的几年间，年轻的文学史教师和学者们再次以文学史写作为志业。从国外视角看来，中国学界对于文学史书写和阅读如此地重视，是一种奇观。因为在当代西方学院里，文学史只是讲述文学来龙去脉的历史，功能无非是为了研究文学的脉络和依据。各语言文学系很少能以如此庞大的师资群、耗费如此多的心力投注至一本又一本的文学史写作。因此“何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学史大国？”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书写文明所强调的诗与史的互动，形塑了不断铭刻文学/史的动机。我们也可以说，时至近代，文学史和国家史之间已存在着共生关系：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自己的历史，更应该有代表这个国家的文学史。这样的观念始自十八世纪西方，逐渐东来，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土地上开花结果。据此，书写文学史就是一种对于国家身份的认同，对于文学主体和政治主权之间的呼应。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量出现，和时代的历史需求或更明确地说，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期许，息息相关。时间再往